

## 前 言

我们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80年代中期,集体编写了一部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被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流行颇广。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相当活跃,有关论著、论文数量众多,其中并有若干有分量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新著。我们也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集体编写了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些都为出版较早的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这部批评史新编,以原来的三卷本为基础,体例框架大致照旧,分为两册,按时代前后,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代前中期、近代七编。在内容方面则变动较大,对原著作了许多增删,重写了不少章节,改正了过去一些不妥当的提法,因此改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在内容的改动方面,主要吸取了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研究成果,也参考了时贤的若干看法,由于体例限制,未能一一注明,请读者谅解。

原著编写者除我们两人外,尚有袁震宇、李庆甲、黄霖同志,刘大杰先生曾对上册进行审阅,并作了部分修改。前此,刘先生、李庆甲同志已先后去世。参加此次新编撰写工作的是王运熙、顾易生、袁震宇、黄霖、杨明、邬国平同志。具体分工如下:

杨 明:第一编,第二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编中的绪论、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

王运熙:第二编中的第三章、第四章,第三编中的第一章第四、五节、第二章、第四章。

顾易生:第四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编中的第一章。

袁震宇: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编中的第二章,第六编中的第五章,第七编中的第二章。

黄 霖:第四编中的第四章第三节,第五编中的第三章,第六编中的第六章,第七编中的第一章、第三章。

邬国平：第六编中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第四、五、六、七各编的绪论由顾易生、袁震宇、黄霖、邬国平共同撰写。

王运熙 顾易生

2001年2月

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 第一编 先秦两汉



## 绪 论

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萌芽阶段。这个阶段与文学有关连的意见,大抵只有片段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学术著作中。两汉时代则有所发展。这一时期有关文学的意见,有许多仍是片段的,散见于哲学、历史等著作中。但已出现了一些专篇的论文,如《毛诗序》、班固的《离骚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议论较为系统。《诗经》和《楚辞》的注释,反映了当时人对于具体作品的理解,也是研究汉代文学批评应该重视的资料。

### 文学、言、辞、文章

学习、研究先秦两汉的文学批评,首先应注意辨明若干名词概念。

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学作为物质手段而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以美感的作品。但在古代,“文学”一语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先秦典籍中,如《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文学”亦指从事于学问,提高文化修养。汉代依然如此。《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据《史记索隐》引如淳曰,指历法、度量衡的制度、法式),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文学”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学问、制度等。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各种学问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者,于是给人一种印象,即“文学”一语常常指儒学而言。如《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又《儒林列传》:“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

总之,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一语与今日“文学”的含义不一样,它不但不是就审美而言,而且也不包含运用语言文辞进行写作的意。当然,如果从学问的对象、所研习的典籍的角度说,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典籍,如《诗经》,也是包括在内的。它也是子游、子夏所熟悉的典籍,是荀子所提倡的“学问”的对象,但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并不被视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学问”的资料、教材看待的。

先秦典籍中有论及“言”、“辞”的资料。言、辞当然与运用语言有关。上举《论语·先进》所说“言语:宰我、子贡”,便是说宰我、子贡长于政治外交辞令、宾主应对等语言表达。以文字记录语言,便是文章。因此典籍中论及言、辞之处,虽然还不能说等同于今日之论文学,但至少可以作为论文章写作的资料看待。

到了汉代,写作能力日益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各类应用性文字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再一方面也是由于辞赋等受到帝王、上层人士的喜爱,实际上被作为审美欣赏的对象。于是就用“文章”一语指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或指具有写作才能。“文章”一语先秦时就有,但只是泛指文采彰明之意;汉代则在沿用其旧义的同时,赋予新义,用以指写作。有时也说成“文辞”、“文词”。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奏曰:“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又《三王世家》太史公曰:“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让,群臣守义,文辞烂然,甚可观也。”又如《汉书·地理志》:“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又《公孙弘传赞》:“文章则司马迁、相如。……刘向、王褒以文章显。”“文章”既指写作,则与今日所谓“文学”有关系,但仍不等于今日之“文学”。因为当时“文章”所指范围甚广,富于审美性质的辞赋、诗歌固然在内,而一切实用性文字也都包含在内。《汉书·扬雄传》云:“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可见学术性著述也好,审美性强的作品(辞赋类)也好,成部的著作也好,单篇制作也好,都在“文章”范围之内。

先秦两汉之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章”的含义仍然宽泛,指一切用文字写下来的作品。“文学”也仍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但与先秦两

汉相比,又有重要的变化:由于在知识分子中,写作渐渐成为极普遍的事,写作能力几乎成为士人文化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文学”自然而然地常常包括了写作之意,而可以理解为常兼指文章与博学两方面的意义。当然,其含义与今日所说“文学”仍不等同。

综上所述,我们研习文学批评史,见到典籍中“文学”、“文章”等语词,须仔细辨别,不可轻易认为就相当于今日之“文学”。

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先秦时人们的文学观念还十分薄弱。也就是说,当时人议论作品时,几乎不是从审美的角度出发的。例如《诗经》,就基本上不是被当作动人的抒情诗歌,而是被当作修身和从事外交、政治活动的工具加以议论的。汉代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一方面,仍然用很强的功利性的眼光评论文学作品,甚至因此而轻视、排斥文学的审美性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包含审美因素的言论,也有人从审美娱悦的角度肯定文学作品。因而当时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复杂的状况。

先秦时诗歌与音乐紧密配合,诗、音乐、舞蹈往往三位一体。因而人们对于诗与音乐的见解,也常是相互联系,有时不易分别。但诗论与乐论毕竟不完全等同,我们应看到其间的联系和影响,也注意其区别。事实上,先秦乐论的审美因素多于诗论,而逐渐影响及于诗论。

### 儒、墨、道、法诸家的文学观

春秋战国是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变化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思想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哲学等方面的主张,形成了诸子争鸣、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局面。在诸子百家的论著中,包含不少与文学有关连的见解,它们虽大都尚未形成完整的篇章,但已有一些较为深刻的原则性的论点,对于后世的文学批评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儒家在这方面的观点,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道家虽没有多少与文学有关连的言论,但由于其思想、著作对后人影响深刻,因而当文学创作、批评的实践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便由道家思想得到启发,运用其著作中的概念、命题等来表述对于文学的看法。

儒家的创始者孔子很重视文化、学术。他的言谈中有关文学者,一是论“诗三百”,二是论言辞。他赞美“诗三百”“无邪”,认为“诗三百”有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作用,是修身和从事政治、社会活动

所必需的教材和工具。在语言表现方面,他首先强调内容,但也重视文辞的表达、修饰。孟子在阅读、理解作品方面,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主张。他的“知言养气”之说,对于后世文学批评也很有影响。荀子非常重视言辞、辩论。他是最早对儒家圣人和经典作崇高评价的学者,他这方面的言论可以视为后世文学批评中明道、征圣、宗经说的先声。《荀子·乐论》和总结孔子后学音乐思想的《礼记·乐记》,都非常重视“乐”。一方面指出了乐产生的基础、乐对社会的反映及其认识作用,另一方面强调乐对人们的教化意义。先秦儒家的乐论谈到了乐与人们情感、心理的关系,比起先秦时纯粹的诗歌理论来,较多地具有审美的因素。而这些论述对后世的诗歌理论又有深远影响。不论孔子还是孟子、荀子,都很重视诗歌、言辞、音乐的社会功能,强调利用它们为教化服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的文艺思想适合于统治阶级对文学艺术的要求,而其中某些观点又能触及文学的基本规律方面的问题,故在文学批评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墨家是东周时的一个重要学派,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其创始人墨翟,鲁国(一说宋国)人,略晚于孔子。墨家从实用、功利的目的出发,重视言辞辩论。《墨子·非命上》说:“言必立仪。”意谓言谈须有标准、目的。同篇提出“言必有三表”,即以古圣王之事、百姓的实际经验、运用于政事而产生的效果三者作为检验言谈的标准。《墨子》书中又总结了言谈辩论的种种方法,如运用假设、譬喻、类推等等。这些论述虽是论言谈,但实有益于说理论文的写作。对于人们的艺术审美活动,墨子采取排斥态度。他认为音乐、歌咏、舞蹈、美术等虽给人以快乐,但却奢侈浪费,“亏夺民衣食之财”(《非乐上》);认为儒家“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活动,荒废时日,妨碍君子听治、庶人从事。(见《墨子·公孟》)此种观点,在当时统治者穷奢极欲、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是可以理解的,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一概排斥审美活动,其实是狭隘片面的。

法家学派形成于战国时期。商鞅奠定了法家理论的基础,韩非则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家崇尚耕战,主张君主独裁,厉行法制,对于传统文化学术和儒、墨、名、纵横诸家学说,认为不切实用,而且妨碍其愚民政策的实施,故加以全面排斥。他们将《诗》、《书》、学问言辩之士斥为虱子、蠹虫。虽然他们也有少数言论涉及言辞,如要求制定法令须“明白易知”(《商君书·定分》),又如《韩非子·难言》说到游说人主时种种言辞的不同风貌,又如《韩非子》中某些寓言故事(如秦伯嫁女、买椟还珠)可以被借用来反对过分雕饰



文辞,但是,总的说来,这一学派对于文学批评极少贡献。

道家主要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有要求回归上古简质淳朴时代的倾向,因而对音乐、言辞、辩论等都持否定态度,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认为美丽的色彩、音乐使人“失性”。但是《老子》、《庄子》却对后世的文艺思想,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具有深远的影响。道家崇尚自然无为,那原本不是论文学。但当文学创作、鉴赏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崇尚自然的主张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上,成为反对雕琢、提倡自然之美的理论根据。《老》、《庄》书中关于语言局限性、言与意的关系的论述,启发了后世作家、批评家对于含蓄之趣、意在言外那种艺术表现的体会、认识和追求。又如《老》、《庄》书中对于虚静、“坐忘”心态的论述,原是就体认“道”而言的,但也被借用、引申,用以论述艺术家、作家的思维特点。道家学说之所以会影响到后世的文学批评,与后世知识分子对其热烈喜好,他们的人生观、精神世界受到道家学说的深刻影响是分不开的。

最后,还应提一下屈原的发愤抒情之说。其《九章·惜诵》云:“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指出自己的作品乃是在愁思郁结、愤懑无告、“愿陈志而无路”的情况下倾吐而出。《九章·抽思》云:“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更说到凭借写作以舒泄忧思、暂时获得解脱的情况。屈原的说法,比《尚书·尧典》“诗言志”之说更突出了情感因素,可说是后世发愤著书、不平则鸣以及借作文以自慰诸说的先声。

### 汉代文学批评的演进

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较过去有很大发展。韵文方面,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乐府诗歌,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辞赋在《楚辞》和纵横家辩说的影响下,产生了很多作家作品,《史记》、《汉书》都为擅长辞赋的作家立了专传。刘向、刘歆编校图书,在《七略》中特立“诗赋略”登录并论述诗赋,就是诗赋作品大量涌现的实际情况的反映。在散文方面,除一部分学术、历史著作中具有文学价值的篇章外,各种体裁的单篇文章逐渐多起来了,论说、书序、奏议、书启等等,不一而足。此外还有韵文体和韵散结合的文体颂、赞、箴、铭、哀文、诔、碑文等等。这许多体裁的文章,大多属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实用的文体,但同时人们也注重它们的写作艺术、审美因素。两汉文学批评的发展,就是建筑在上述文学创作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汉代的文学批评,和当时的政治情况、学术思想有密切的关系。汉初统治者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和秦朝短期覆灭的教训,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剥削,与民“休养生息”。学术方面,则提倡黄老,人们的思想还没有受到严格的限制。从武帝到宣帝,是西汉帝国政权最巩固、国势最强大的时期。在学术思想方面,武帝采取了独尊儒学的政策。于是在文学批评中,儒家文学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当时的批评家,即使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不同,但无不标榜儒学,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儒家思想的束缚。对于作品的艺术特色、审美因素,批评家们已有所认识,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议论,但他们总是更强调作品的政教作用、功利目的。

汉代文学批评的内容,以论述、解释《诗经》、评论屈原及其作品、评论汉赋三者较为集中。

“诗三百”在西汉时被尊称为经。当时传授、阐释《诗经》的有齐、鲁、韩、毛四家,今天只有毛诗基本完整地流传下来。从《毛诗序》和注释(毛传、郑玄笺)中可以看到,汉人非常重视诗歌的政教作用,强调美刺,要求诗歌“发乎情,止乎礼义”,为封建政治服务。在艺术表现上,要求委婉含蓄、风格温厚。他们解释诗篇时,常附会政治,多穿凿之说。汉代的《诗经》学是过去长时期来儒家诗论的总结,对当时和后代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影响。

评价屈原及其作品,是汉代文学批评的一项重要内容。西汉最高统治者爱好《楚辞》,汉武帝曾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刘安给《离骚》以崇高评价,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可与日月争光。以后司马迁、王逸都继承了刘安的看法。扬雄、班固也肯定屈原及其作品,但班固认为刘安的评价过高。综观汉人对《楚辞》的评价,他们都认为屈原作《离骚》等作品有讽刺之意,具有政治意义。司马迁则还强调《离骚》之作,乃“自怨生”,充分肯定其怨恻的特色。王逸也屡屡指出《楚辞》的忧愁痛苦之情,还指出屈原的写作具有“自慰”的作用。对于《楚辞》的艺术性,汉朝人都都给以充分的肯定,他们都指出,《离骚》运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认为这是学习《诗经》的结果。另一方面,汉人对于屈原的执著而终于自沉,在同情的同时,又多有表示不理解者。贾谊、司马迁已流露此意,扬雄、班固更为明显。特别是班固,指责屈原“露才扬己”,贬损了自己的高明清洁。王逸则对班固的指责严加驳斥。班固对屈赋的大胆想像、运用神话传说也表示不满,认为“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王逸对此也予以驳斥,认为屈赋中这些内容是依托《五经》的。在这些地方,王逸与班固针锋相对,却都是以是否合乎儒家思想和经

典为立论依据。

赋是汉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也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对赋给以肯定评价的有司马迁、班固等人。扬雄早年爱好作赋,后来则施以激烈的抨击。而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从赋是否能达到讽谏目的、实现政教目的的角度立论的。这也反映出汉代文学批评的功利性,反映出儒家文学思想的局限。而汉宣帝却在承袭功利观念的同时,正面肯定了赋的审美愉悦作用。宣帝好赋,经常命侍从之臣创作,并品第其高下。有人认为赋“淫靡”,宣帝那样做是从事“不急”之务。宣帝说:“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汉书·王褒传》)虽然仍依经立论,但毕竟肯定了文学作品“辩丽可喜”、“虞说耳目”即审美作用的正当合理,因此值得注意。其实汉朝人好赋,必定含有审美欣赏的成分。不过只有汉宣帝才正面加以肯定罢了。

## 第一章 先秦的文学批评

### 第一节 《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中所反映的文学观念

在先秦古籍《诗经》、《尚书》、《国语》、《左传》中,已有一些与文学批评有关的言论。它们反映了早在儒、道等学派产生之前人们的文学观念。

#### 美刺和言志

在先秦时代,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之世,陆续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诗歌,后来结集成为《诗经》,成为我国诗歌的第一部总集(《诗经》本来只称《诗》,也称为“诗三百”,或“三百篇”。后世儒家列为经典之一,故称《诗经》)。在《诗经》的少数诗篇中,有些作者表达了自己写诗的目的和态度,对于文学的社会作用,表现出朴素的认识。例如: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履》)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家父作诵,以究王讟。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小雅·节南山》)

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

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小雅·巷伯》)

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

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大雅·崧高》)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大雅·烝民》)

这些诗篇的作者们意识到:诗歌可以用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对于

某些生活现象和政治情况的态度,对于美好的人和事加以称颂,对于丑恶的事物则加以讽刺或讽谏。

这些例证表明:在我国,很早就有将文学创作与社会和政治相联系的理念。这种通过创作诗歌对政治情况和人物进行赞美和讽刺的观念,在以后的《诗大序》中,就发挥成为“美刺”说。

这些例证也表明:在很早的时代,人们就把诗歌看作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发露。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概括,就是所谓“诗言志”。《今文尚书·尧典》说:

帝(虞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段话自然不可能是上古所谓尧舜时代的原始文献。《尧典》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这段话或许是春秋战国时期所写。但“诗言志”的说法,与上引《诗经》中例证所体现的观念相一致。即使这一说法正式提出较晚,也还是可以视为西周、春秋之际人们对于诗歌性质、功能的认识的一种概括性表述。

美刺和言志都反映了古代人们对于诗歌的一种认识:作者通过诗歌表露自己的内心世界,表达对于社会中人和事的观点和态度,并且希望诗歌对社会、政治发生影响。这种认识,虽然到汉代才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但其萌芽和成长时期却早在先秦时代。

关于言志,《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曾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但这里的“诗”却不是指创作诗篇,而是指“诗三百”中现成的诗篇。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享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赋诗言志。所谓赋诗言志,是借“诗三百”中的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如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即借该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达自己与赵文子相见的愉快心情,《左传》记载这种史实很多。可知春秋时列国间公卿大夫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常常这样赋诗言志。赋诗者往往不管原诗的整体内容,只取其某一点的相同或类似。这叫做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齐国卢蒲癸的话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清楚地表明了当时人们的这种观念。除外交方面外,当时人们在一般言辞中间,也颇多断章取义地运用“诗三百篇”。春秋以后,赋诗言志的情况不复存在,但在言辞和论著中断章取义地引用“诗三百”,却一直延续到战国和汉代。这种风气对文学批评

也发生了一定影响。

战国时的典籍《庄子》和《荀子》也曾说到“诗”和“志”。《庄子·天下篇》说，古之道术有存在于《诗》、《书》、《礼》、《乐》者，“《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说《诗》、《书》、《礼》、《乐》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显然《庄子》、《荀子》所说的“诗”都是专指《诗三百》而不是一般的诗歌，所说的“志”也并非泛指。但它们的这种说法，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先秦时代，诗言志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 观志和观风

从作诗、赋诗的角度说，是言志，是美刺；从听诗的角度说，就是“观志”和“观风”。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请郑七子赋诗时说：“武（赵文子名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又昭公十六年记载韩宣子对郑国六卿说：“二子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这是“观志”和“知志”。但赋诗者既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听诗者所观、所知之志也并非作诗者之志，并非诗歌的原意，而是与原诗无关的赋诗者之“志”。

“观风”见于记载比较晚。《礼记·王制》说：“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艺文志》更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这些说法出自汉人，后世有些研究者以为不可信，但当非完全捕风捉影。虽然周代未必有完备的采诗制度，但可能有过采诗观风的事实。据《左传》、《国语》记载，西周的开明统治者很重视从诗歌中了解下情，以利于改进政治。《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师旷对晋悼公的话说：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

又《国语·周语上》载，周厉王使卫巫监谤，召公谏曰：

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国语·晋语六》记载范文子对赵文子的告语，也有“古之王者……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之类的话。《左传》、《国语》所说公卿列士以至盲瞽乐师

所献的诗歌,可能有的是自己的创作,有的是别人的作品。不论如何,可知统治阶级中某些人是重视通过诗歌考察民情的。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一段吴季札在鲁观周乐的记载,描绘很具体,写季札依次听取了“诗三百”各个部分的演唱,一一作了评论,由其特点来探讨各国的民情风俗和政治盛衰。这是一篇流传至今的孔子论《诗》以前最完整的文艺(音乐和诗歌)批评。这段记载比较夸饰,其中有些言辞可能是追记时所增添,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史记·吴太伯世家》也采录了这段记载)。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邠》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迥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这里可以看到,季札是用社会的、政治的眼光去看“诗三百”的,他将“诗三百”看作是社会、政治状况的反映。《礼记·乐记》说“声音之道与政通”,又说“审乐以知政”,那是对于后世文学艺术批评具有很重要影响的理论。它形成系统的见解固然是以后的事,但从季札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具有这种认识了。季札的评论特别强调中和之美。他用“忧而不困”赞美《邶》、《鄘》、《卫》风,用“思而不惧”赞美《王风》,用“乐而不淫”赞美《豳风》,

用“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十四个句子赞美《颂》，都显示出这一特点。以后孔子也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种见解，逐渐发展成为儒家诗乐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

### 三不朽

《左传》、《国语》中还记录了一些人们关于言辞的说法，也关系到文学批评。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所记三不朽之说，就对于后世很有影响：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曰：“……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穆叔的三不朽之说，是当时统治阶级的一种看法，它表明了他们对于言辞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言辞很重要，可以使人不朽，但其地位在德行、功业之下。虽然这里的“言”，主要是指有关德教、政教的言辞而不是泛指，但到了后世，这三不朽的说法常常被用来作为讨论文章著述以至一般文学创作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根据。

## 第二节 孔子(附《易传》)

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他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他的学说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孔子生活在古代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代，生活在奴隶制度解体、封建制度萌芽的时代。他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是比较复杂的，既有进步的一面，也有消极保守的一面。

孔子非常熟悉前代、特别是周初以来的文化遗产，所谓“诗”、“书”、“礼”、“乐”，大都经过他的整理，并传授给他的门徒们。孔子的文学见解，大都表现在他的教学活动和对于前代文化的评论中间。这些资料主要见于《论语》一书。

### 论《诗》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为孔子所编纂。



后代学者对此多有怀疑。由于文献不足,今已难于确考。但孔子重视这部诗歌总集,并用来作为教授生徒的重要内容,则是毫无疑问的。孔子评论“诗三百”的话,对于后世文学批评有深远影响。

孔子以《诗》为修身之具。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何晏《集解》引包咸(后汉人)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皇侃《义疏》引江熙(东晋人)曰:“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可知“兴于《诗》”是从古人诗篇得到启发、引起向上之志的意思。孔子又曾告诫其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也是从道德修养方面说明学《诗》的重要。《论语》中还载有孔子与弟子论《诗》的两件事,从中可以知道孔子是如何以《诗》为修身之具的: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

子贡领会孔子之意,懂得须加以学问修养之功方能进一步提高道德、人生的境界,并引用《卫风·淇奥》的诗句表述自己的认识,故孔子称赞他学《诗》有得。又: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

“素以为绚”原是说女子以白色妆点其容颜,而子夏体会出虽有美质,尚须以礼修身的意思。孔子认为这样学《诗》有益于修养,故加以称赞。从这个例子中可以见出孔门以《诗》为修身之具,与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一样,是可以离开全诗的本来意义而断章取义加以发挥的。

孔子又从政治、外交方面说明《诗》的效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认为学《诗》是为了懂得政事和在外交活动中很好地进行应对。这与春秋时代的赋《诗》言志有密切关系。孔子又曾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也是从言辞应对方面强调学《诗》的效用,认为学《诗》可以提高语言表达的能力。

关于《诗》的功用,孔子还有一段话说得比较全面: